

回鹘文始用时间考

李树辉

(新疆社会科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回鹘文是在胡人文化影响下由粟特文演变、发展而来的一种音素文字,碑铭及出土文献也反映了突厥语族群从对粟特文的借用到改造的演变、发展轨迹,而借用粟特文字母来拼写突厥语也就标志着回鹘文的产生。《多罗郭德纪功碑》可证回鹘文至晚在552年已开始使用,而哈喇和卓古墓群发现的以粟特文字母书写突厥语kifi(人,妻子)字样的“代人木牌”还意味着回鹘文极可能于482年已开始使用。通常认为回鹘文是继如尼文之后开始使用的,就目前所见碑铭及出土文献可断定,其使用历史远要早于如尼文,应是最早用来拼写突厥语的文字体系。

关键词:回鹘文;粟特文;始用时间

中图分类号:K281/2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1)03-0119-05

Study on Uighur Scripts' First Using Time

LI Shu-hui

Abstract: Uighur Scripts is a kind of phonemic language, which is developed from Sute Scripts under Hu culture's influence. An inscription on a tablet and documents also reflect the process that turkic tribes from using Sute Scripts to reforming Sute Scripts. Using Sute Script letters to spell turkic marked Uighur Scripts' arising, which also indicate Uighur Scripts' first using in 482 A.D. at the latest. Uighur Scripts enjoy a longer history than Runi Scripts, which is an earliest scripts system to spell turkic Scripts.

Key words: Uighur Scripts; Sute Scripts; first using time

回鹘文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因回鹘人曾广泛使用过这种文字而得名。事实上,回鹘文曾被包括回鹘人在内的诸多突厥语族群和非突厥语族群(如粟特人和高昌地区的汉人)所使用,并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回鹘式蒙古文、满文及锡伯文的创制,甚至连契丹文的创制也与回鹘文不无关系。目前,由于对突厥语族群相关历史的认识还不甚明了,以至于在回鹘文的始用时间问题上也难以达成共识。学术界认为,回鹘文是继如尼文之后开始使用的,“回鹘文……8世纪下半叶已被使用”^[1],或“在763年摩尼教输入回鹘汗国不久”^[2],或“回鹘文的产生最迟不晚于8世纪”^[3]。连最具权威性的《辞海》“回鹘文”词条也称回鹘文“自唐至明(8世纪至十五世纪)主要流行于今吐鲁番盆地和中亚楚河流域”^[4],或“公元8~17世纪流行于今新疆、甘肃

一带及中亚”^[5]。本文拟结合文献、碑铭和出土文书对回鹘文的始用时间问题试加探讨。

一、粟特文的借用:从突厥语族群和粟特人的关系谈起

学术界公认回鹘文是由粟特文演变、发展而来的一种音素文字,回鹘文的创制和使用都与粟特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故而,探讨回鹘文的始用时间必须从突厥语族群对粟特文的借用谈起;而若探讨突厥语族群对粟特文的借用,又必须从突厥语族群与粟特人的关系谈起。

春秋战国时,河西走廊及东部天山地区为西戎的游牧之地。^[6]战国末年,原居于鄂尔多斯一带的一支月氏人徙居河西走廊^{[7][8]}。当地的西戎或融

本文为笔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科研项目《新疆通史·辅助工程·突厥语文献研究》(XJTSB046)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突厥语文献研究》(07TQB069)的子课题。

收稿日期:2011-04-03

作者简介:李树辉(1957-)男,河南正阳人,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新疆历史和突厥语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化及古文献研究。

于月氏,或退至东部天山地区。公元前209年,匈奴太子冒顿继任单于后^①,在不长的时间内“尽服从北夷”,且“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继而“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人”^②,一跃成为北方“引弓之民”的共主。匈奴对北方草原的统一,打破了各族群间的隔离状态,客观上促进了阿尔泰语系居民和印欧语系居民间的文化交往。由此亦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不同人种、不同文化间的大融合。此后,乌孙的西征,5世纪后半叶至6世纪上半叶嚧哒对乌古斯突厥人的统治^③以及其后乌古斯突厥人对中亚的统治等,更加速了人种的混化和文化的交流。

乌古斯人是吐鲁番地区最早的居民之一,乌古斯部族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史记·大宛列传》称作“姑师”,《汉书·西域传》中除“姑师”外又有“车师”之谓。此后,又有“滑”、“八滑”、“滑国”、“乌护”等称名^④,均是oBuz一词的不同汉译。乌古斯是部落及人口最多的一个突厥语部族,也是构成前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的主体部族。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将“滑”、“八滑”或“滑国”与嚧哒相等同,而不曾有人将“滑国”与“高车国”及前突厥汗国相联系。其实,嚧哒属于印欧人种,操用印欧语,而“滑国”即前突厥汗国属于蒙古人种(史称木杆可汗“面广尺余”^{⑤⑥⑦⑧⑨⑩⑪⑫}可予以证明),操用突厥语。

二者所处的地理方位也不相同,嚧哒在据有塔里木盆地、东境达于焉耆后,才与“八滑”搭界。“滑”,古音读gu,为oBuz的略音便译。所谓“八滑”也便是《汉书·西域传》所载之“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4世纪末,附属于拓跋鲜卑的柔然渐趋强大,到402年时已统一了漠北草原。社仑任首领时兼并诸部,称雄北方,乌古斯诸部落为柔然属部。十六国时,“八滑”又转投嚧哒。梁武帝天监十五年(516年),滑国始遣使向南朝贡献方物。《梁书·诸夷传上》称:

滑国者,车师之别种也。汉永建元年(126年),八滑从班勇击北虏有功,勇上八滑为后部亲汉侯。自魏、晋以来,不通中国。至天监十五年(516年),其王厌带夷栗陀始遣使献方物。普通元年(520年),又遣使献黄师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七年(526年),又奉表贡献。

称“其王厌带夷栗陀始遣使献方物”(此语亦见于《南史·夷貊列传》),是因为滑国当时受厌带(嚧哒)统治,正与《洛阳伽蓝记》的记载相合。《魏书·西域传》称“西域康居、于阗、沙(疏)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据同传可知,受嚧哒役属的“小国”还有朱居国(今叶城县)、渴槃陀国(今塔什库尔干)、钵和国(位于今瓦罕谷地)、赊弥国(约位于今巴基斯坦西北之奇特拉尔一带)、乾陀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等。《北史·西域传》亦有大

致相同的记载。麹嘉任高昌王期间,“属焉耆为挹怛所破”^⑬,意味着塔里木盆地周边诸国均受其统治。

这期间,高昌地区的乌古斯居民受汉文化影响而取其部族名的略音便译形式“滑”为姓^⑭。此后,还曾以“车”(古音读gu)姓见于史籍,如徙居焉耆的车师前部王名车伊洛(此据《魏书·车伊洛传》,《北史·车师传》作“车夷落”),子名车歇、车波利。车歇、车波利与车伊洛分别于541年和542年入朝北魏,定居洛阳,有“前部王故车伯生息妻鄯月光墓铭”为证。周一良先生也认为:“车伊洛既是焉耆胡,不袭用焉耆国王之龙姓,而取车为姓,封号又为汉以来车师惯称之前部,盖以其虽一度属焉耆,而实为车师人也”^⑮。同时认为《八琼室金石补正》16收西魏大统元年王慎宗造四面象记中所列的“车枕洛”、“车洛□”等车姓八人,亦可能是车伊洛之后^⑯。至于其部民则仍留居在高昌及焉耆境内,仅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车姓便有14次之多^⑰。焉耆及吐鲁番地区生活有大量的印欧人种居民,操用突厥语的乌古斯人自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开始便与印欧人种居民有着密切的文化接触。

自6世纪上半叶以降,生活在东部天山地区的乌古斯人推翻了柔然的统治,并进而征服了嚧哒,开始了对中亚的统治。《梁书·西北诸戎传》、《南史·夷貊列传》、《通典·边防九·西戎五》、《通志·西戎下》、《太平寰宇记·西戎四》及《册府元龟·外臣部·交侵》等对此都有明确记载。如《梁书·西北诸戎传》“滑国”条称:

(滑国)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犹为小国,属芮芮。后稍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开地千余里。土地温暖,多山川树木,有五谷。国人以疏肉为粮。其兽有狮子、两脚骆驼、野驴有角。人皆善射,著小袖长身袍,用金玉为带。女人被裘,头上刻木为角,长六尺,以金银饰之。少女子,兄弟共妻。无城郭,毡屋为居,东向开户。其王坐金床,随太岁转,与妻并坐接客。无文字,以木为契。与旁国通,则使旁国胡为胡书,羊皮为纸。无职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则出户祀神而后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为椁。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讫即吉。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

此段史料称滑国“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犹为小国,属芮芮”,是指其主部曾于后魏时徙至今山西一带。《魏书·高车传》所载世祖时“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十万落……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正可予以证明。487年,其首领阿伏至罗率10余万落返回东部天山地区,建立了“高车国”。同传称:“先是,副伏罗部为蠕蠕所役属,豆仑之世,蠕蠕乱离,国部分散,副伏罗阿伏至罗与从弟穷奇俱统领高车之众十余万落。太和十一年(487年),豆仑犯塞,阿伏至罗等固谏不从,怒,率所部之众西叛,至前

部西北,自立为王,国人号之曰“候娄匭勒”,犹魏言大天子也。穷奇号“候倍”,犹魏言储主也。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罗居北,穷奇在南。”所谓“后稍强大……开地千余里”,更印证了“滑国”也便是“高车”,即前突厥汗国。《通典·边防九·西戎五》在上段后还增加了一句“至后魏时,谓之滑匡”。“匡”字的读音和语义不详,但据此而断定滑国=高车=滑匡当无异议。至于“无文字,以木为契。与旁国通,则使旁国胡为胡书,羊皮为纸”等语,既可证“滑”不属于胡人,即不属于印欧人种,也可为回鹘文是在胡人文化影响下由粟特文演变而来的观点提供佐证。撰写于568年的希腊文史料亦称:“当拜占庭皇帝在翻译的帮助下获知了国书的内容(因为这些国书是用斯基泰文或粟特文所撰)之后,非常亲切友好地接见了使者。他向他们询问有关突厥人地区及其政府的情况。”^[18]

史籍中常以“胡”指称“深目高鼻”的印欧人种居民。所谓“无文字,以木为契”,正与《隋书·突厥传》等史籍有关突厥“无文字,刻木为契”的记载相合;而“与旁国通,则使旁国胡为胡书,羊皮为纸”则应是指粟特文而言,也正与《北史·高昌传》“兼用胡书”、“皆为胡语”的记载相合。至于所书写的语言究竟是粟特语还是突厥语,因史无明载,尚难以遽断。虽则如此,倒也印证了回鹘文是由粟特文演变、发展而来的一种文字。

早期的回鹘文与粟特文没有多大的区别,因而只能根据所使用的语言来辨别粟特文文献和回鹘文文献。目前所知的早期碑铭文献大多是用粟特文撰写的,如1956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bygyt地方发现的《布古特碑》,三面刻写的是草体粟特文、粟特语,另一面则刻写的是婆罗谜文字和梵语。碑文记载了木杆特勤(muqan tegin)的事迹,并提到佗钵(taspar)可汗“愿建一大的、新的佛教寺院”。苏联学者Klyaxorniy、Levxets认为该碑“建于公元580年左右”^[19]。可与此相印证的是,另在新疆昭苏县种羊场小洪纳海石人粟特文题铭第6行有mwχ'n/x'γ'n/npysn/Bry/……P'Y/nry/x'y'n(muχan可汗之孙,像神一样的……nri可汗)的内容,第3~4行也有rty/21/srδ/'xs'w'nh/δ'r(持有王国二十一年)的内容^[20]。“muχan可汗”也便是木杆可汗,“nri可汗”(另见于铭文第8、11、18行)亦即泥利可汗。泥利为木杆之孙、挐素特勤之子,隋开皇七年(587年)继任可汗,卒于开皇末年(600年)或仁寿元年(601年)。碑铭所记载的都是突厥人的事迹,据此推断,当均出自粟特人之手,应是突厥语族群对粟特文的借用。

二、回鹘文的起源 :从对粟特文的借用到对粟特文的改造

学术界关于回鹘文的起源,早期存在着“福音体文字来源说”和“粟特文来源说”两种观点。前一

种观点的立论依据主要有二:一是回鹘文与叙利亚福音体文字在形体上的近似性;二是《九姓回鹘可汗碑》对牟羽可汗时期回鹘改信摩尼教一事的记载。杨富学先生对此已有详细辨析,肯定了回鹘文源于粟特文的说法^[21]。笔者亦持这一观点。

然而,作为印欧语族群的粟特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对突厥语族群产生影响的,回鹘文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开始使用的?学术界的认识却一直非常模糊。如立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布苏省(Увсаймгийн)图尔根苏木(Тургэнсум)地区哈尔乌苏(хар ус)的《多罗郭德纪功碑》的语言为地道的突厥语,亦是文字最多的一份早期回鹘文文献。但其撰写年代迄今还未能确定下来。该碑原文的国际音标转写为:

1. ɛr atim buqan tegin, jɛti j (ɛ)g (i)rmi j(a)ʃimta bor-luχ-ta
2. syl(ɛ)dim.miŋ jont al-tim.toquz j(ɛ)g(i)rmi j(a)ʃim-ta
3. ɛtki tonuχu tyn-tɛ syl(ɛ)dim(i)z.ɔz-kɛ jaβar
4. j(a)ndim,j(ɛ)g(i)rmin-tɛ aʃtim.tuχ(u)m tolun, jilq-i
5. tɔpynʃ tɔlyk kɛz(i)gi tygɛr.bu lu ɔgyz
6. altim.bɛn otuz jaʃ(i)m-ta ɔmuz-a sanʃt(i)m(i)z.
7. toplaju bɛrdi.t(ɛ)ŋri taχ ɛltɔkigɛ aj
8. ɛzrua kyn.

汉译文:

1. 我(男子)名木杆特勤。我十七岁时曾在borluχ(=bujluq,葡萄园,葡萄沟)。
2. 打仗,缴获了一万匹马。我十九岁时。
3. 我们在仅能辨识的(?)夜里打过仗,我方受挫(?)。
4. 我返回了。我过了二十岁,鼓圆了^④,大牲畜。
5. 在山岗上的那种沉着、稳健的勇气将完全丧失^⑤。我夺取了。
6. 这条龙河。我三十岁时,我们攻取了高岗^⑥。
7. 集合起来了。天山eltokige月。
8. 梵王天日。

碑文中个别词句的语义虽然还有待于进一步推敲,但语言为地道的突厥语却是无可置疑的。杨富学先生认为“该碑的时代无法确定,仅知为840年回鹘汗国迁徙之前的遗物,差强可证回鹘文在漠北回鹘汗国的使用”。^[22]笔者则认为确定其时代并非难事,碑文中已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首先,以buqan tegin(木杆特勤)之称见诸于文献者仅有一人。其次,木杆特勤之父土门(tym□n)于魏废帝元年(552年)正月自号伊利可汗(□l qa□an),约于当年便去世,可汗由木杆继任^[23]。由碑文中自称“木杆特勤”度之,当立于552年。碑文中的单数第一人称代词作b□n而非m□n,与土瓦第1碑、《乌裕克-塔尔拉格(uyuq-tarlaq)碑》及《噉欲谷

碑》(即《巴音楚克图碑》)相同,具有典型的乌古斯方言特点(碑文中称其为buqan tegin而非muḡan tegin亦是明证)。

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碑文中将“龙河”称作luøgyz.lu是汉语“龙”的音译,用于龟兹以东的东部突厥语中,西部突厥语则使用源于焉耆-龟兹语的nag^⑦。前突厥汗国为乌古斯部族所建^[24],碑文的语言也正与此相符。碑文中的tɛŋri taβ(天山)一词,表明木杆特勤的活动区域在天山地区。ɛzrua(梵王天,梵天)一词源于粟特语,东部天山南北地区正是粟特居民的重要栖息地。

出土于吐鲁番三堡的《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中有“其后,属突厥雄强,威振朔方,治兵练卒(卒),侵我北鄙”的记载。麴氏高昌王国自佗钵可汗在位的555年开始便沦为前突厥汗国的属国,佗钵可汗正是木杆可汗的弟弟。555年即高昌建昌元年,是麴宝茂执政的第一年,而麴斌其人既是此前统军与突厥交战的将领,又是后来与突厥谈判的使臣。战事最终以双方王室缔结婚姻——麴宝茂娶佗钵可汗之女而告结束。麴斌施产建寺也正与庆祝高昌、突厥间休战“交好”、“同盟结婚”、“永固邦疆”事密切相关^[25]。

至于碑文中提及的地名borluβ当就是指今吐鲁番的葡萄沟。现今葡萄沟地名在维吾尔语中称bujluq,是典型的突厥语“j方言”(东部方言)词汇,其“r方言”形式正写作borluq/borluβ^[26]。lu øgyz(龙河)、tɛŋri taβ(天山)、ɛzrua(梵王天,梵天)、borluβ(葡萄园,葡萄沟)等专名也都表明与吐鲁番盆地关系密切。此碑无疑是最早的回鹘文碑铭文献,所记史事可与《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相印证,表明回鹘文至晚在552年已开始使用。同时,也与《周书·突厥传》有关“其书字类胡”的记载相吻合。称其文字与粟特文相类似,显然是指回鹘文而言。

1975年春,考古人员在哈喇和卓古墓群发现18枚“代人木牌”。第91号墓的4枚木牌和第90号墓的9枚木牌,正面以汉文书写“代人”二字,背面是以粟特文字母书写的突厥语^[27]。其中1枚的文字为突厥语的kiʃi(人,妻子),另两枚拼写的为汉语的rin(人)和tairin(代人)^[28]。同墓还出土有1件永康十七年三月廿□日的汉文纸文书残片(编号为75TMK90 27),另有2件只书“十年”而没有年号。“永康”是柔然郁久间予成的年号。按《魏书·蠕蠕传》的记载,永康十七年应为480年,但吐鲁番出土的《妙法莲华经》残卷跋记中却有“永康五年岁在庚戌七月”字样。依干支推算,永康五年为470年,永康十七年应为482年。由于《魏书·蠕蠕传》系后人所补,而《妙法莲华经》残卷却为时人所写,学术界普遍认为以482年较为可信^⑧。该墓出土的以粟特文字母书写的突厥语词木牌进而表明,回鹘文可能于482年已开始使用。

1980年,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也曾出土一件与

建昌五年的汉文文书卷在一起的回鹘文摩尼教文献^[29]。“建昌”分别为柔然豆罗伏跋豆伐可汗和麴氏高昌麴宝茂的年号。前者相当于512年,后者相当于559年,学者们断定应属麴宝茂的年号。这一件回鹘文文献亦可为上说提供一个参考。据笔者研究,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 nom bitigi)便是麴乾固及其夫人——突厥佗钵可汗之女tyzyn于高昌延昌十五年(乙未年,575年)三月请僧人抄写的^[30]。

唐初,玄奘西行求法途经高昌时,麴文泰曾“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至西突厥汗国后,叶护可汗曾“更引汉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国书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悦”。玄奘行前,可汗又“作诸国书,令摩咄送法师到迦毕试国”^[26]。麴文泰及叶护可汗所修书信当均是以回鹘文书写的,可见到7世纪初时,回鹘文的使用已相当普遍。此前,因无其他佐证材料,学者们对《周书·突厥传》的记载多持怀疑态度。碑铭和出土文献都证明,史籍中的记载非但可信,且其有文字的时间还可进而上推至482年。

三、结 语

综上所述,回鹘文是在胡人文化影响下由粟特文演变、发展而来的一种音素文字,碑铭及出土文献也反映了突厥语族群对从粟特文的借用到改造的演变、发展轨迹,而借用粟特文字母来拼写突厥语也就标志着回鹘文的产生。《多罗郭德纪功碑》可证回鹘文至晚在552年已开始使用,而哈喇和卓古墓群发现的以粟特文字母书写突厥语kiʃi(人,妻子)字样的“代人木牌”还意味着回鹘文极可能于482年已开始使用。通常认为回鹘文是继如尼文之后开始使用的,就目前所见碑铭及出土文献可断定,其使用历史远要早于如尼文,应是最早用来拼写突厥语的文字体系。

注释:

①《集解》徐广称:“冒顿于秦二世元年壬辰岁立”。该年也便是公元前209年。

[后魏]杨街之撰《洛阳伽蓝记》卷5云:“口歇哒国……受诸国贡献,南至牒罗,北尽敕勒,东被于阗,西及波斯,四十余国皆来朝贺……四夷之中,最为强大。”“嚧哒国北部为乌古斯部族的栖息地,即所谓“北尽敕勒”。“敕勒”即“特勤”,为突厥语tɛgin的音译,意为“王子”。宋云于神龟二年(519年)十月初至口歇哒国,所说的“敕勒”指室点密。

敦煌市马圈湾出土第282号汉简对此有明确记载,其文称:“郡仓居摄三年正月癸卯转两入 一 居摄三年四月壬辰大煎/粟小石卅一石六斗六升大/都步昌候史尹钦隧长张博受就人敦煌高昌里滑护字君房。”(吴初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简文大意为:敦煌郡仓于居摄三年(8年)正月癸卯(农历正月二十五日),陆续运来粮食。至四月壬辰(四月十六日)入大煎都候官(玉门都尉府辖下的候官,在今小

方盘城西南42公里)。由大煎都候官之步昌候史(步昌燧为大煎都候官所辖烽燧之一)尹钦及隧长张博从运粮夫滑护手中接收。滑护字君房,敦煌高昌里百姓。此简值得注意者有二:(一)撰写于“居摄三年”,表明公元8年时敦煌已有高昌里;(二)滑姓出自车师,高昌里民滑护应为车师国移民后裔。此人除姓名外又有字曰“君房”,意味着其家族在敦煌居住有年,汉化已深(疑“滑护”为o□uz的音译;“君”为突厥语kyn的音译,据《史集》记载,kyn为乌古斯部族六大支系中的长支,早期乌古斯部族的领导者皆出自该部,“君房”极可能是指此人出自该支系)。史称,征和四年(前89年)“开陵侯将兵别围车师,尽得其王民众而还”。家父李正宇先生推测,其民众当是于该年被移徙至敦煌,并置高昌里予以安置的(李正宇著《敦煌学导论》,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tub(u)m tolu二词的语义颇费解。tub(u)m系由tub派生的名词,通常释为“旗”、“旗帜”。然而,tub本身是一个多义词,据《突厥语大词典》(以下简称《词典》)记载,分别表示“鼓”、“在国王面前敲的鼓”、“纛”、“旗”、“旗帜”、“旌旗”、“堤坝”、“盖子”等多种意思(参见[喀喇汗王朝]M(hmut Q((q ri《Tyrki tillar diwani》卷3,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5~176页)。tolun的语义为“满”、“圆”(同上书卷1,第522页)。参考碑文上下文,笔者暂将二词合译为“鼓圆了”。

此句译文仅供参考。jrlq-ri的语义为“大牲畜”(同上注引书卷3,第44页),jopyntf的语义不详,疑该词由topy“山岗、顶部、头顶”(参见上注引书卷3,第298页)附加表示比拟语气的词缀-ntf构成,jolyk疑为tolæk“沉着的、稳重的、镇静的、安宁的、安心的、安定的、安稳的、平静的、无忧无虑的、无所顾虑的、满不在乎的”(参见上注引书卷1,第503页“tolæk”词条)的变体,kex(i)gi应是由kexig“勇气、胆量”(参见上注引书卷1,第508页)附加名词第三人称领属格词尾-i构成,jyger由动词tyge“结束;够”(参见上注引书卷3,第368页)附加动词现在-将来时附加成分-ri构成。

omuz也便是obuz,意为“山岗、高岗、丘陵”(同上注引书卷1,第76页);-a为向格助词,santf(i)m(i)z由动词词根santf-附加动词过去时第二人称复数词尾-timiz构成。santf-意为“刺杀、战胜”(参见上注引书卷3,第572页“santfdr”词条,卷2,第330页“santfıqtı”词条,卷2,第334页“santfıldr”词条,卷2,第312页“santfıdr”词条)。参考上下文,笔者将二词合译为“我们攻取了高岗”。

李树辉:《〈突厥语大词典〉诠释四题》,刊于《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后收入新疆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编:《新疆少数民族古籍论文选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修改文收入校仲彝主编:《〈突厥语词典〉研究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参见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刊于《文物》1978年第6期;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侯灿:《高昌楼兰研究论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118页;[日]白须净真:《高昌墓砖考释》(三),刊于《书论》第19号,1981年,第158、163页;王素著:《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36~137页。

参考文献:

[1]W.Radloff,Altürkischen Studen,Извесмия Акабемий

Hayk CCCP,1912,319.

[2][21][22]杨富学.回鹘文源流考辨[J].西域研究,2003,(3).

[3]张铁山.突厥语族文献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4]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5]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6][9]史记·匈奴列传[Z].

[7]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翦伯赞.论史前羌族与塔里木盆地诸种族的关系[A]/中国史论集,第2辑[C].1947.

[10]周书·突厥传[Z].

[11]北史·突厥传[Z].

[12]通典·突厥上[Z].

[13][16]隋书·高昌传[Z].

[14]李树辉.车师(姑师)的语源、语义及源流考辨[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9,(3).

[15]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7]杜斗城,郑炳林.高昌王国的民族和人口结构[J].西北民族研究,1988,(1).

[18]法·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M].耿昇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19]耿世民.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20]王英梅.小洪那海石人[J].新疆文物,1997(2).

[23]岑仲勉.突厥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8.965

[24]李树辉.乌古斯与突厥、回鹘、突厥蛮关系考—乌古斯和回鹘研究系列之六[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1,(4).2002,(1、4).

[25][30]李树辉.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译写年代及相关史事探赜[A]/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历史与文化[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26]李树辉.吐鲁番地名Bujluq(葡萄沟)探源—兼谈葡萄种植技术的东传[J].西域研究,2002,(3).

[27]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1978,(6).

[28]库尔班·外力.吐鲁番出土公元五世纪的古突厥语木牌[J].文物,1981,(1).

[29]多鲁坤·闾白尔,斯拉菲尔·玉素甫.吐鲁番出土的几件回鹘文书研究[J].语言与翻译,1988,(1).

[31][唐]慧立,彦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孙毓棠、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

[责任编辑 张 科]

[责任校对 胡成霞]